

费正清 评传

〔美〕邓鹏 著



天地出版社

[美] 邓鹏 著

费正清评传



费正清评传

[美] 邓 鹏 著

责任编辑·彭学云

封面设计·文小牛

版面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出版发行 天 地 出 版 社

(成都市桂花巷 21 号 邮编 610015)

印 刷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0 千 插页 8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ISBN7—80624—080—2/K·03



1972年5月，费正清夫妇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期间，他们重访了自己30年代在北京北总布胡同里的故居。



费正清在坎布里奇的旧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37年间，天天下午四点在这里举行茶会，与同事、学生和亲朋好友交流思想，切磋问题。

March 22, 1995

Dear Mr. Deng -

In your letter of March 12, 1995, you mention my husband's book on H.B. Morse and ask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is to publish it in the autumn of 1995. It is to be entitled H.B. Morse (1855-1934)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Two of his devoted students have put it in final form.

John Fairbank's final book, finished by him and also delivered by him to the Press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n September 1991, is entitled China: A New Histor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 Press in Spring 1992. It starts with Paleolithic China and comes up to date. It is widely used here for teaching.

In 1986 he published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and Row). Between 1978 and 1991 he concentrated on Vols 10, 11, 12, 13, 14, and 15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England) for which he found leading specialists on the history of Late China,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led and edited their contributions.

Meanwhile he also gathered and published 4 volumes on Sir Robert Hart and the China Customs Service provid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1866) -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tween 1975 and 1991.

Though he had retired and no longer taught, his research and writing kept him busy and happy. He moved most of his working library to our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of New Hampshire about 100 miles north of Boston. There he could work uninterrupted and he and I could walk along the river or through the woods he loved. Our two daughters and their husbands presented us with grandchildren, now totalling three so he had the fun of becoming a grandfather before the end.

I hope this will be useful to you.
I especially love "Fairbank Remembered" and hope you will use quotations from it.

Sincerely -

Wilma Fairbank

ps

I believe he was proudest of his role in gathering and supervising the wri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umes.

邓先生：

承蒙您在 1995 年 3 月 1 日的来信中问及我丈夫的有关马士的专著的情况。这部著作将在今年秋季由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H·B·马士（1855—1934）：海关税务司和中国史专家》。该书是由他的两名得意门生最后完稿的。

我丈夫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是《中国新史》，他在 1991 年 9 月临终前几天亲自将该书的稿子交到哈佛大学出版社。这本书于 1992 年春问世。在这本书里他叙述了从旧石器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目前许多美国大学历史系都采用它做教材。

1986 年他发表了《伟大的中国革命》。1978 至 1991 年他主要致力于《剑桥中国史》的第 10、11、12、13、14 及 15 卷的撰写编辑工作。他为这部著作的晚清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物色了这些领域里的权威学者，领导他们的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加以汇总修改。

1975—1991 年间，他还收集了赫德爵士的书信及清朝时期中国海关的资料，这些文献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退休以后他不再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使他忙碌不休而心情愉快。他把自己研究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书籍搬到我们离波士顿一百英里左右的新罕布什州乡间的别墅，在那里他可以安静地写作。休息时他爱和我一块儿在河边或树林里的小径上散步。我们的两个女

儿都已成家，她们共有三个孩子，她们两家常去看望我们。这给约翰的晚年增添了一份天伦之乐。

我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我尤其喜欢《回忆费正清》一书。希望你能采用那里面的材料。

诚挚的 威尔玛·费尔班克

1995年3月22日

我相信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为《剑桥中国史》所做的组织和编辑工作。

威尔玛 又及

写给中国读者（代序）

邓鹏教授写了这部我的丈夫费正清的传记。在它即将问世的时候，他要我给它的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费正清的几部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但是就我所知，邓鹏的《费正清评传》是第一本由中国人来介绍他的生平的著述。对此我万分感激。

费正清二十二岁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此后终生从事中国研究，从未间断。30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四年，其间他亲身体验了传统的中国社

会。随后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及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8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近代中国历史后，对以上事件做了逐一研究。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他辛勤工作，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而经他指导的博士生今天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一百多所大学里任教。

在他的晚年，费正清访问了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当然也访问了中国。他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曾有许多中国学生，而且跟许多富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共过事。他十分珍视跟他们的关系。

最后，我衷心希望这本传记能唤起中国读者对我的丈夫的兴趣。

威尔玛·费尔班克

1997年1月5日

前 言

美国与中国，两个伟大的国家；华夏与亚美利加，两个伟大的文明。两个文明，一个年青，一个古老，两个国家，隔着浩瀚的太平洋遥遥相望。曾几何时，两个文明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邂逅，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的中国人在世界性的大迁徙中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谋生，继而成了新大陆的建设者。几乎在同一时期，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也来到了中国。他们当中，有的行纵横捭阖之术，建立和发展两国邦交；有的买进卖出，逐什一之利；有的走家串户，传播上帝的“福音”；有的开办学校，介绍美国的科学和民主制度；因之

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不过，在中美两国的邦交史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而已。只有少数人能对两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费正清。

费正清这个名字，对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听说过他的人也寥寥无几，即使知其名，对其人其事也不甚了了。那么，费正清究竟何许人呢？

在今天美国的汉学界，恐怕无人不知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中国的历史学家，多半也知道费正清。费正清生前是哈佛大学的终生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自1945年他执教于哈佛起，到1992年去世的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和教学不仅直接影响了三代美国的汉学家，而且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作为学者，费正清文思敏捷，终生笔耕不辍，他的著述之丰，为美国汉学界罕见。他一生编撰的57部著作，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954) (1953)、《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195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1986)和《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1992)都不愧是西方研究汉学的经典之作，为西方的中国学学者的必读书籍。此外，他还为数十种报刊写了数以百计的短文和评论。这往往使

研究他的人惊讶之余，不禁油然而起敬。

美国的汉学，起步较迟。直到本世纪 40 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零碎的，远远落后于欧洲和日本的同行。然而费正清和他的同事及学生，辛勤劳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短二三十年间，不仅使这一领域跻身于美国历史学界的前列，而且使中国研究成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里最活跃、最浩大、最丰富多彩的领域。这种世界学术史上的奇迹，跟费正清个人的研究和组织工作是分不开的。以他的才华之横溢、对事业之执著、著述之丰硕、观察之敏锐、眼界之开阔、组织能力之干练，在美国汉学界至今无有出其右者，他不仅是美国汉学界的无冕之王，而且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的泰斗。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名人的产生，总要借助一些机遇。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伴随的是特殊的挑战。他跟许多同龄人一起，经历了 20 世纪的急剧变革，也体验了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刚刚步入中国历史的领域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而美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味姑息，实在是远东绥靖主义的始作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作为一个低级外交官员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弊病，深入了解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与此同时，他初步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同情。中国内战期间，费正清第三次来华，短短几个月里，他亲眼看到马歇尔的“调停”中国内战

的破产。由此他在研究中国革命的同时，愈益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

此后，费正清的学术活动就担负了双重使命：一方面，他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变成美国公众可以理解、并且可以接受的信息。完成第一项任务需要的是穷经皓首的执著。在这一点上，费正清和古往今来的所有优秀学者一样，对自己的事业专心一意。后一项任务相对而言也许更困难一些，尤其因为费正清在学术上的开拓跟中美关系的历史巨变几乎同步，美国政府的敌视中国的冷战政策和美国一般民众的反共恐共心理严重阻碍着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认识和接受。于是，在帮助美国公众认识中国的同时，费正清还必须帮助他们了解美国自身，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和对华关系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沿革。这种“再教育”，不仅需要大智大慧，而且需要耐心。费正清的一生成就表明他在这方面有杰出的才能。结果是，他的学术研究常常有鲜明的现实性，他的史学跟时事评论常常互相交融，相得益彰。这种风格在美国汉学界是不多见的。

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特殊的学术活动、特殊的学术范围和学术思想。费正清的整个思想和学术体系因之也跟美中关系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一些学者在内，对美中关系的态度都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念为准绳，以国家利益为圆心，对中国革命作形而上学的观察，将它简单地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和苏联向世界扩张的一部分；对它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渊源不是一无所知，就是一知半解。而费正清则不然，从开始研究中国之初，他就

十分注重中国的社会实际及其文化内核。他跟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在中国内战时期，他就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初步尝试对中国革命作历史的考察。

除此之外，他的活泼而流畅的文风又赋予他的史感和史识一种强有力的载体。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于青年时代的刻苦攻读，更由于他生性机敏狡黠，他的许多论述既有西塞罗的雄辩，又有吉朋的严谨，还有马克·吐温的幽默和诙谐。他对西方文明史的把握更为他的中国研究作了厚实的铺垫。这使他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方面终于独树一帜，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巨匠。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费正清在西方汉学界名闻遐迩，人们对他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专题研究却很有限。真正有分量的仅只1990年出版的加拿大学者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的《费正清与美国人对现代中国的理解》（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而已。埃文斯60年代末就学于哈佛大学，与费正清私交不错，他在撰写《费正清》一书时得到费正清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费正清破例向埃文斯开放了他所有的私人档案。这使埃文斯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费正清：历史学家及学术企业家》。将近二十年后，埃文斯又把他的论文加以充实，成书出版。1995年，陈同、罗苏文、袁雯铭和张培德等将它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费正清看中国》。这本书材料丰富、详实，对费正清的评价比较中肯。但毕竟是出自西方人之手，观点当中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经求

学于费正清门下，对他的老师有提纲挈领的论述；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郝延平教授对费正清的生平和成就也有介绍，称他“著作等身”。然而，他们对费正清一生的概括还是稍嫌粗略，且有偏颇之处，尤其是余英时的《费正清与中国》一文，根本否定了费正清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看法，说他“毋甚高论”。果真如此的话，费正清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就很值得怀疑——出发点都错了，过程还能正确吗？那么，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界的领导地位从何谈起？难道因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平心而论，费正清的“国学”修养当然不能跟钱穆、陈寅恪、白寿彝这样的中国学者相提并论，费正清自己对此从不掩饰。但中国学者和西方国家里的华裔学者的“国学”素养只是一方面的优势，单就对美国汉学界的影响，他们根本无法与费正清相比。而在我看来，余英时先生在这里言之过激，似乎也并不太了解费正清后期的著作。

至于由黎明、贾文玉等人翻译的《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与陆惠勤、陈祖怀和宋瑜翻译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叙述按严格的时间顺序，文字虽然极其生动，内容详实，但叙述不免有些拖沓，有些内容即使对中国的历史学界意义也不大，不少中国学者读起来恐怕会有隔世之感。不过，这些译著毕竟为我们全面认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既然费正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此深远，中国的学术界应该给他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进行一番评说。这就是我决心不揣浅陋，撰写此书的动机。

我认为，研究费正清在今天至少有以下意义。首先，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对中国的研究、尤